

10.13



# 文史资料辑存

第十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  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## 编辑说明

一、本辑存刊印的目的，在于保存和积累地方历史资料，借以广泛团结各界人士，激发爱国热情，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。

二、本辑存所收资料，大都是撰写者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，可供编写地方史、志和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。

三、本辑存所收资料的期限是，上起戊戌变法，下止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。凡属这一时期有关常熟地区自然、社会、人文等方面的资料，不拘观点，不限体裁，不论形式，不求完整，均所欢迎。

四、本辑存编辑者对来稿可以选择、摘录、删节或作结构上的调整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
五、来稿凡经选刊，略致薄酬。

六、本辑存在内部发行。限于水平，编印工作中的缺点、错误在所不免，欢迎读者对本辑存所载资料提出补充、订正或质疑，对编辑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
# 文史资料辑存第十二辑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“民抗”和六梯团部队的点滴情况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周建平( 1 )                |
| 回忆我在常熟的斗争经历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张梦莹( 8 )                |
| 常太地区开始组织游击队的过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周毓文( 14 )               |
| 抗战时期统战工作杂忆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王赓唐( 17 )               |
| 一个小集镇上的抗日救亡活动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李克为( 19 )               |
| 毛柏生等工商界爱国人士捐款支援“民抗”纪<br>实·····        | 黄绳之 黄忠整理( 23 )          |
| 蹈火行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曹大铁( 26 )               |
| 日军战犯米村春喜伏法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汪莫邪( 31 )               |
| 五四运动在常熟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李祖华整理( 35 )             |
| 回忆五四时期常熟的时事演讲会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陈惺轩( 43 )               |
| 常熟旧司法概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奚翔凤( 45 )               |
| 常熟新闻史话——风雨廿载忆报坛(上)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汪青萍( 54 )               |
| 一册影响深远的袖珍诗集<br>——浦薛凤选辑《白话唐人七绝百首》····· | 陶耀东( 77 )               |
| 常熟书场旧闻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朱琪 顾鸿希 浦熙炎 孔萍 陈元元( 82 ) |
| 常熟评弹史话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顾鸿希、浦熙炎、孔萍( 97 )        |
| 书场杂咏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梅寄鹤遗著( 112 )            |
| 平襟亚和弹词创作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沈秋农( 125 )              |
| 关于义局的史料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本会整理( 127 )             |
| 王庄千人会起义始末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周文晓( 129 )              |

瞿式耜遗爱在民——谈刘铎《丰江瞿父起田翁考绩应召

- 序》及其他……………瞿凤起(136)
- 唐文治撰《常熟松禅图书馆纪念碑》……………沈传甲供稿(140)
- 附：读茹经师撰《常熟松禅图书馆纪念碑》……………沈传甲(143)
- 唐文治撰《张君瑞隐墓志铭》……………瞿凤起供稿(145)
- 翁同和与“周氏浩敕”……………李炎锟(148)
- 先父虞山派印人赵古泥……………赵林(153)
- 附：金鹤冲撰《赵古泥墓志铭》
- 虞山园林小识……………花病鹤遗稿(158)
- 福山史话……………朱冠军 陆遵宏(167)
- 留将几许写琴川

——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社会教育师范简介

- ……………陶焜(170)
- 常熟学前小学解放前概况……………郑耀民(179)
- 从市立女校到学前小学……………朱善余(185)
- 日伪时期私立常熟中学改名为省立第七中学的
- 经过……………沈焜 季良生(188)
- 抗战前常熟会计训练班办学史实…何震鸿、徐保衡、朱琪(191)
- 辛亥以来常熟盐业的变迁……………浦熙炎、梅廷良、朱琪(197)
- 裕泰纱厂餘闻……………朱仁寿(204)
- 《文史资料辑存》一至十二辑目录汇编……………(212)

## “民抗”和六梯团部队的点滴情况

周建平

我参加“民抗”是一九三八年，其时“民抗”成立还不久。我流亡回来时，常熟到处都有游击队，有好几个部队，我哥哥周嘉禄部队也是其中一个。“民抗”是以任天石的塘桥部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。那时，一般青年都不大愿意去“民抗”，有的人去了不久就离开了。因为“民抗”比较艰苦，强调群众纪律，管教亦严，别的游击队发薪饷，“民抗”只有饭吃。

我开始在“民抗”政治处当政训员，“民抗”部队主要由杨浩庐、赵伯华带着。李建模是常熟县委书记。任天石虽不负责带部队，但经常到部队来。以后陈岳章到了“民抗”，了解了我过去的表现，介绍我入了党。不久决定我去二分队任政训员（在我之前，冯二郎〈焦明、刘平若〉可能任过二分队政训员），那时候，“民抗”还只有两个分队。一分队长赵云鹤，政训员陈岳章；二分队长李文魁。到了这一年冬天，“民抗”又建立了三分队，分队长潘发棠，政训员夏期发。“民抗”二分队原在塘南地区活动，由于部队日益发展扩大，给吃饭穿衣带来了新的矛盾，在我们“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”的口号和“二五”减租的政策指引下，被派到塘北何村一带收田亩捐。这样，既解决军费困难，又减轻农民负担和团结地主抗日。同时，做群众工作。何村地区过去“民抗”未去过，但有徐少川徒弟小陆星在那里活动，敲诈勒索，鱼肉乡民，农民痛恨之极。他也不想收田亩捐，就与我们发生磨擦。我经常到吴家村（吴家段）茶馆去宣

传发传单，小陆星得悉了便去报告鬼子。一次，我正在收田亩捐，常熟据点内来了一个鬼子。我们拿起三八枪准备打，老百姓不让我们打，说打了不得了，东洋人要来烧房子。为了不使村民遭殃，我们没有去打。又有一次，我们遭到了小陆星的突然袭击。他带了十几个人一下子冲到我收田捐的办公地方。我对小陆星说：“我们都是徐大队长(徐少川)的部下，你要收田亩捐，我们收了也是交给徐大队长的，你收我收不都是一样吗！”他无话可说，又不敢打我。我请他们坐下来喝茶，讲了一通抗日道理。他们窃窃喳喳了一阵，小陆星煞有介事地站起来说：

“这样吧！哪些人交过田亩捐的，把名单交一份我们，已交的，我可以不收。”说罢，他们走了。事后，我到大队部向杨浩庐、赵伯华作了汇报，他们决定派赵云鹤、陈岳章的一分队到塘北来。他们未来之前，我们又受到小陆星的一次夜间袭击。我们二分队是每天夜间移动的，白天在驻地的村上训练、上课，天黑之前部队就转移，但距离并不太远。小陆星不知道这个情况，还以为我们仍在前夜宿营的那个村子上，晚上九点钟光景就伏在村外打排枪袭击。我们听到枪声赶去，他们已走掉。

一分队到塘北后，我们一、二两个分队便在一起活动，不久就在何村附近跟王兴、小陆星部队打了一仗，捉到一个俘虏，经大队部教育，给了些钱，放掉了。其时，“民抗”已有三个分队，每个分队有三、四十人。大队部带了三分队常在小陆泾一带活动。从此以后，小陆星感到靠自己的兵力已无法与“民抗”较量了，于是他联合赵培芝、赵培芳，以及常熟的日伪军，对我塘南、塘北地区进击和“扫荡”，终于发生了所谓“民抗”的“一·七”事件。

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，日伪军和土匪向我们“民抗”发动

了一次进攻，气焰很嚣张。“民抗”虽然是党领导的部队，战士都是工人农民出身，很纯洁，武器装备也不差，指挥员赵伯华又是老红军。但我们的力量毕竟弱小。为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援，党组织决定扩大同外部的联系，要我到无锡梅村邓本殷部队做联络工作。当时梅村虽有强学曾部队，实际上主要是邓本殷部队。邓本殷在北伐时期是个军阀，海南岛琼崖的司令。北伐军把他搞垮了，他就跑到上海，同一个德国女子结了婚。抗战开始，他就组织游击队，利用他在琼崖当司令的旧影响、旧势力，收集了一些广东军队的败兵，以无锡鸿山为主要据点，在梅村、鸿山、大墙门一带活动。他的部队有战斗力，里边有我们党的同志做工作。第一次去邓本殷部队，是杨浩庐带我去的，跟在邓部的一个党员叫陈达取得联系。杨浩庐告诉我陈是上海党派下来的。第一次见到邓本殷，他住在一个地主宅里，很阔气。专门有几个女人服侍他。早上吃牛乳、鸡蛋等营养品，生活奢侈，怎能打游击！以后就由我一个人去邓部联系，有时邓要驳壳枪子弹，我也送一些去。一次，我带一同学去梅村，因鬼子来“扫荡”邓部不久，邓的部队散在农村，寻找不到他们，在茶馆里休息。我问茶馆老板：“邓军长的部队到哪儿去啦！”引起了在茶馆里的邓部一个侦察员怀疑。我们走出茶馆后，就被盯住了。走到一条桥上，我正准备跟他拚斗，他却掏出了驳壳枪逼着我们跟他走到了鸿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，他们二大队的驻地，把我们当成汉奸关在小屋里。后来，邓的二大队大队长知道我们是从常熟来的，有关系的，便把我们送到邓部收税的一个卡子上，邓本殷在那里等我。记得这天正好是旧历年的大除夕，邓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饭。我们曾经要邓本殷部队到常熟来，邓本殷也准备来，但后来终于没有来。以后传说，“江抗”到了无锡梅村时，也委了邓本殷什么职务，

但不知何故邓跑掉了，跑到了国民党三战区，发表了一个反共宣言，暴露了叶飞和新四军六团的真实面目。

那时候，我们同胡肇汉也有联系。我到过胡肇汉部队，只知那里有党的同志宫岳，但未见过面。我与胡部的副司令陆步青本来很熟悉。陆原来是党员，后来失去了联系，宫岳就是经过陆步青的关系到胡肇汉部队的。记得有一次，不是第一次，我去胡部，乘一小船从太平桥回来，航行了一、二里，碰上曹长金的第十一梯团部队去进攻胡肇汉部队，实际上去太平桥抢劫。曹长金部的尖兵班看到我坐的船，喝令靠岸叫我上去。那些尖兵拿着“关公式”的大刀，大嚷：“坏人坏人，把他杀掉。”我心想，不是死得太冤枉了。真无计可施，十分着急，突然走出一个“程咬金”，他们的尖兵班长原是我家乡陆巷铁铺子打铁的，见到了我，忙说：“他是周嘉禄、周副官长的弟弟”。他们才把我放掉了，终于化险为夷。我乘船沿阳澄湖边航行，见到了陆步青，告诉他曹长金的部队来了，他要我快走。他们的部队也就转移离开太平桥。周嘉禄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与“民抗”有了联系。

以后为了加强六梯团的领导力量，组织上决定我到六梯团去工作，时间大约是一九三九年的三月份。我由杨浩庐带着到六梯团去，走在半路上，杨浩庐建议我换个名字，我想了一想，把原名周嘉善改为周建平。我去六梯团后，任三大队一中队中队长，并不是集训中队。三大队名义上有三个中队，实际上只有两个中队，一中队和三中队。三大队大队长赵石屏，但我没有跟他见过面，我初去印象较深的，是一次陈震寰、吴善述、周文在检阅部队的事。那时候我到六梯团还不久，这天轮到我值星，把一、三两个中队一百多人集中了起来，我发口令，向团长作报告，还指挥了阅兵式。陈震寰见我挺有精神，夸赞说：



“民抗来的都是好的。”我们中队中有徐庆、唐大，和金恒熙三个排长(分队长)。后来王志平来当我们中队指导员。

我记得六梯团三大队一中队奉命离开徐市地区到东塘市时，徐庆、唐大等一些骨干都不愿意去，他们说我们拉部队是保护家乡的，走掉后，附近的土匪部队要来捣蛋怎么办？有的还哭鼻子。为此，任天石专门来做他们思想工作。我开始懂得，由地方部队上升到野战军，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教育过程。我们部队由赵伯华、周文在带着，以东塘市为中心活动了一个时期。其时曹长金部已被日寇“扫荡”搞垮。像“民抗”一样，我们到了东塘市地区，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。由于季节关系，不好收田亩捐。赵伯华参加过广西百色武装起义，曾任红军团长，有股冲劲。一次，我们去石碑捉拿坏人，部队在岸上走，赵伯华乘小船走水路，部队走到离石碑里把路，听到石碑方向传来快慢机声。赵伯华恼火地冲着我：“你们为什么不跑步前进，敌人已经打枪啦！”我们进了石碑镇，战士又不会搜索，只抓到一个两面派镇长。要他出钱，他不肯，被杀了。这种政策不久就纠正了。我的通讯员原在曹长金部队，到我们部队后，发了他一支三八枪。那知过了二、三个星期，小家伙拖枪跑掉了，那时三八枪是最好的枪，丢失了还了得！当即由唐大去寻找，结果在芦花塘里抓到了。虽然我争论再三，治军极严的赵伯华，还是毫不容情的把小家伙斩了，记得小家伙颈颈里缠着围巾，天气还有寒意。

我们与“江抗”(六团一营)会师的经过，我记得很清楚。由杨浩庐布置我带部队到涓泾塘附近，交给我一张呼口号的单子。“江抗”由王(王萱椿)营长带领从梅村经过大墙门来到涓泾塘时，我就组织部队呼欢迎口号。待“江抗”部队通过州塘、苏常公路封锁线，向太平桥方向进发以后，我们部队才回

太平桥。我们到达驻地，天已拂晓。“江抗”的战士已呼呼入睡。大家都讲：“主力部队厉害，跑得那么快！”我们平时夜行军一般走三、四里路，还没有一下子走过几十里路的，而且走得很慢。通过这次行军，我们部队加强了夜行军的锻炼。我们在太平桥会师以后，就和“江抗”一起回到小陆泾、塘桥一带，打梅李等地伪军和土匪武装了。

老六梯团应该说是一支抗日的部队，团长陈震寰有抽鸦片的嗜好，但民族意识还是有的。他是抗日的，只是他斗不过熊剑东，部队被熊控制了。

胡肇汉起初与我们关系比较好。陆步青没有死，宫岳还在时，我黄埭乡师的好几个同学都在胡肇汉部队。胡部与我们关系是很好的。“民抗”“一·七”事件后不久，胡亲自带部队配合“民抗”进攻土匪吴文信部。以后，我们把他部队带走，好比抄了他家，挖了他的老根，怀恨在心。再一个，我们有些地方在执行政策上也可能有些问题，对他争取工作没有做好，加上敌人的挑拨，结果他变坏了，抓到“江抗”（新四军）人员就要杀。

周嘉禄，是我胞兄。读过八、九年私塾，后来到东塘市一家小布店做学徒。一、二年后，因受不了师母虐待，加之他有肺病，吐了血，中途跑了回来。以后参加了壮丁训练，投到吴县保安队当“帖写”（帮上士文书写东西的），属上等兵待遇，后来又考上吴县保安队班长训练班，几个月毕业后，在吴县保安队当中队的文书。“八·一三”沪战爆发，周嘉禄到洞庭西山找到我。我们和学校里的几位教员，还有地方上的几个进步青年一起流亡到苏北。他到了扬州，举目无亲，进了难民收容所，巧遇吴县保安队的一个同事，介绍他进了当地国民党地方部队当连队文书。至一九三八年五、六月份，他向部队请了长假，回到陆巷，在陆巷组织游击队。这个游击队有二、三

十人，绝大部分是农民。那时候曹长金部队势力很大，号称拥有千人（曹长金原来是个贩私盐的海霸），实际武装七、八百人，大鱼吃小鱼。周嘉禄的部队不久编入了曹部，因他有些军事知识，曹长金要他当副官长。以后曹部遭到鬼子几次“扫荡”，他们一下子就散啦。周嘉禄便带了自己的小部队回到陆巷、肖泾地区继续活动，其时已增至几十人，后来又有进步青年参加了他的部队。如张肇圻、我的同学朱家茂，还有上海来的一些青年等。他的活动区域很小，主要在横泾南部，陆巷北边，肖泾以西，常熟与吴县交界的一些地区。他那里有个副官经常跟我联系。“江抗”东进，他的部队就编入“江抗”五路三支队，周嘉禄任支队长。“江抗”东进到青浦，他没有去。西进时，我在行军路上见到他一次，后来听说他肺病咳血，没有跟部队走，又带了少数人回来了。（黄绳之根据录音记录、整理）

## 回忆我在常熟的斗争经历

张梦莹

1938年11月初，我由上海地下党介绍从上海来到常熟“民抗”部队。到部队来以前，我在上海法租界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救亡工作。这个收容所里，有我们党的同志。我比较接近的有徐世祥（后到苏常太地区，改名徐克强，当过苏州县委的组织部长、县委书记，1942年夏在苏中牺牲了）、周康（即陈一诚，原上海市委党校党委书记，已病故）、陈东华等三位同志，其中同我最接近的是徐世祥。来常熟前，党组织对我的去向问题，曾考虑过两个方案，一是到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里去开展工作，再就是到我们党领导的常熟“民抗”部队。我选择了后者。那次从收容所一起到“民抗”的有六、七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叫章铁民，还有一个姓倪的，到上海来带我们到“民抗”的是张云达。

我们是在上海的江海关码头坐上轮船，经过一夜航行，次日清早到达浒浦。我们上岸后，在浒浦镇附近农村就有人接我们坐船去设在大小陆泾的“民抗”大队部。我们离开了“孤岛”，离开了租界，来到这敌后游击区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一路唱着抗日救亡的歌曲，大家的心情兴奋极了。

记得“民抗”部队在当时不过三十几个人，其中大多是本地农民，还有的是从上海下来的工人和学生。到“民抗”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“民抗”大队长赵伯华，他穿着一身便衣，戴顶铜盆帽，驳壳枪插在胸腰里。他常给部队讲话和带部队出操（负

责日常出操的是潘发棠)。政治部主任是杨浩庐，他虽然以搞地方工作和统战工作为主，但也常到部队里来。

我刚到“民抗”时是当战士，发给我一枝三八枪，五发子弹和一条毯子。那时部队里三八枪很少，发到了算是很高的“待遇”。到了晚上睡觉时，几个人的毯子合在一起，这样就既有盖的，也有垫的了。生活虽然很艰苦，可我们这些青年人都不在乎这一点，生气勃勃，情绪很高。我们每天要放两个小时哨，有时半夜里睡得正香，被叫醒了，就爬起来去换岗，握着枪，注视着动静，也不觉得冬天的严寒了。我刚到部队时穿了一件阴丹士林布的长衫，开始还不肯脱掉，后来背了枪感到不方便，才把下面摺上来，用子弹带束着。最后才把它裁掉。岁末年初，“民抗”办了个训练班，训练班的名称记得是叫“淞沪教导队”，人员是从“民抗”抽一部分青年，从别的地方部队里（也有赵培芝部队的）也抽一部分青年，办了有半个月左右时间。训练班的任务就是做徐少川、赵培芝部队的统战工作，向他们部队成员宣传抗日、爱国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，扩大我们党的影响。训练班的学习内容有三个：一是中国革命史，二是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，三是关于政党方面的知识。当时还编过一本教材，对这三方面的内容写得比较通俗易懂。给训练班讲课的有杨浩庐等人。

训练班结束后，我在“民抗”部队当了班长。接着就打了几次小仗，同赵培芝、赵培芳、王兴、小陆兴等盐贩子搞起来的“游劫队”打，打仗的地点在梅李附近一带。那时“民抗”的活动地区是在梅李西南、塘桥东边这块地方。

1939年3月，“民抗”开始建立分队。任天石兼三分队的分队长，但他主要在地方上工作，不大来部队，我是分队副，整个分队的教歌、上文化课、出操都由我负责。任天石虽然不大

来，可是他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。他是“民抗”部队的司令，在群众中威望很高，大家都亲切地叫他“老天”。记得是在3、4月间，赵培芝、赵培芳、王兴、小陆兴这些人把他们的土匪武装纠集起来攻击我们，因为我们的部队还是小部队，以前打的仗也都是小仗，战斗力和作战经验都很有限，当时的形势确实很紧张，斗争很艰苦。因此我们把队伍化整为零，同时把武器也埋了起来，以避敌之锋芒。枪枝埋伏起来后，任天石和我一起，在老百姓家中转。后来听到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，说这个办法不好，武器一埋起来就手无寸铁，只有挨打，有武器在手，关键时候还好抵挡一阵，打死他一个两个。听了老百姓这个意见后，觉得很对，所以部队又马上把枪扛起来了。

这些土匪部队为什么要围攻“民抗”呢？原因有二，一是他们到处欺压老百姓，我们打了他们，他们就恨透我们；二是“民抗”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，威望越来越高，当地群众参加我们“民抗”的也越来越多，“民抗”同老百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敌人和土匪部队的一举一动都有老百姓来告诉我们，对土匪部队构成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大，因此他们要联合起来围攻我们。

5月间，“江抗”来了。记得“江抗”部队到阳澄湖是在一个晚上。我们听到新四军的主力部队来了，要大会师了，心里很激动。自此以后，“民抗”分队变为中队。中队设中队长和政训员（以后称指导员）。三个中队的中队长和政训员是：一中队陈岳章、赵云鹤；二中队潘发棠、夏期发；三中队李文魁、张梦莹。那时我还没有加入党组织。

6月初，杨浩庐在大小陆经“民抗”大队部同我谈话，并让我填了表，6月10日，杨浩庐就向我宣布我被批准入党了。在我入党后，原担任的政训员也就改为指导员了。

7月5日这天一清早，有人来报告，说是敌人的汽艇来了。我们三中队就随大队部一起行动，在转移的路上鬼子汽艇追上来，当时有一部分同志先过了桥，过桥的那一部分有些伤亡；另一部分就坐船渡到河对面去，我带着一些战士在一个小坟包后面掩护他们渡河，我们最后过河。上岸后大家都向南面转移。就在这时我中了两颗子弹，左臂骨头被打穿。幸得我当时在走动，敌人打得不准，否则我就牺牲了。我跑了一段后就到了老百姓那里。他们赶紧用棉花给我把伤口包起来，看看没有动静就又把我送到一块靠河的稻田里，装成农民的样子。过了一会后方医院的船来了，我就上了船，一直驶到古里附近的一个村子上上岸，见到了张贤、庞露、陈淑贞（现名陈宇）等同志。当时张贤是医院的负责人，庞露、陈宇都是医务人员。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，保证伤病员的安全，医院必须经常流动，有时候每夜都要转移三、五里地，从一个村子转到另一个村子。后方医院有一条船，就是作为转移伤病员和医疗设备、药品用的。每到船靠到村庄后，医务人员就要帮伤病员找门板搭床，洗伤口换药；白天有时隐蔽在村庄上。

我住院期间，任天石亲自来看我，还特地送了一包肉松给我，在那艰苦的环境下，这一包肉松包含了多少深厚的感情。那时，我正躺在船上，因为两个伤口中有一个化了脓要开刀。张贤同志亲自替我动手术，他的医术是很不错的。一个月后我就伤愈出院了。

8月间，我出院后，杨洁庐同志要我到“江抗”去。当时他是“江抗”三路政治部主任，我在组织科当组织干事，组织科长是邓迈。我到三路的时候，部队驻在白茆塘南边。

以后就是西进，一路上战斗不断，最主要的就是同“忠救”的袁亚承部队进行反磨擦战斗。袁亚承的部队，有一部分是从

国民党正规军中下来的，很能打仗，他紧紧盯着我们，有时一天要打几仗。有一天中午，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刚烧好中饭，枪声就响了，大家赶紧投入了战斗，闹得连饭也顾不上吃。还有一次，在江阴一个地方，部队刚停下来，战斗又开始了。一路上我就配合杨浩庐同志在战斗中搞一些后勤工作，如给伤病员搞饭吃，组织担架运伤兵。部队西撤到了西石桥后，陈毅司令做了个报告，大家坐在刚割过稻子的田里。陈毅司令的报告讲了苏南抗日的大好形势，党关于抗日的方针大计等等。

在陈毅同志的报告后，有一天，杨浩庐同志找我谈话，说常熟的“民抗”部队一部分上升到了“江抗”，但在常熟留下来的一部分群众武装仍在坚持原地斗争，“民抗”还要进一步发展、扩大。因此，需要有一部分同志回常熟去完成这项工作。我说我服从组织安排。回来的那天晚上，杨浩庐同志带我们到一个村庄上，同这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，接着就换了便衣。次日早晨，杨浩庐同章铁民等三个为一路，我同陈岳章是另一路，分别出发。我和陈岳章是经人把我们带到戚墅堰坐船走的，船到无锡时，鬼子要搜查，过后我们就上岸在桥边一家小饭店里吃了顿饭，回到船上。黄昏时分船到甘露不走了，我们上岸一看，桥上贴着三十八集团军部队的布告，原来在常熟经常与我们搞磨擦的赵北部队也在这个地方。我同陈岳章商量后决定摸摸情况再说。天黑了，只见赵北的部队都在饭馆里吃饭喝酒。我们转到街西头的一条冷静的小巷里去，看看有什么地方好暂时隐蔽一下，结果摸到了一个停放棺材的小祠堂里，这儿离开镇中心有一段路，不大容易被人发现。这一晚上我们就是在棺材后面度过的。第二天早上，到茶馆里去看看动静，一看才知道赵北的部队已经走了，于是我们马上买票乘船到了徐市，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常熟。这是在1939年10月的事。



我和陈岳章回到了常熟以后，杨浩庐他们也到了。他和夏光等一起重新建立了“江抗”东路司令部，夏光任司令，杨浩庐任副司令，又是政治部主任。陈岳章到“江抗”特务连当指导员，章铁民到后方医院去了，我回到了“民抗”。这时的“民抗”，已改称为司令部。李建模是常熟县委书记兼“民抗”政委，任天石是司令，薛惠民是参谋长。“民抗”有个政训处，李建模就要我当政训处主任。政训处连我共五、六个人。下设组织科，科长是黄之平，年纪很轻，小小个子，上海人。干事归行肇，常熟当地人。宣传科没有科长，只有一个工作人员，叫顾敏，他是上海来的，年轻、活跃，能吃苦耐劳。另外还有一个人比较胖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了。老天、老惠对我们的工作很关心。有一天任天石还为我们政训处全体人员拍了一张集体照。新建的“民抗”原先只有塘南、塘北两个常备队，以后董浜，徐市、东塘市等地方也都有了常备队。“民抗”又重新发展、壮大起来了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政训处从1940年春起开办了几批短训班，大约轮训了几十个人。学员主要来自各地常备队的基层干部。

学习内容以毛主席的《论持久战》为基本教材。由于这些干部大都是农村来的，文化程度较低，所以采取以上课讲解和组织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。我们又在“民抗”司令部机关办起了军人俱乐部，出了一些墙报，开展了歌咏活动。江南社发来的有关学习的小册子，也经过我们分发到部队中去。

1940年5月谭震林到了常熟，根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，“江抗”东路指挥部成立，谭震林化名林俊任司令兼政委，张开荆任参谋长，吴仲超任政治部副主任。“民抗”上升编为“江抗”东路指挥部第一支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也被调到“江抗”东路政治部工作，从此就离开了我曾经战斗过的水乡常熟，踏上了新的征途。（沈秋农整理）